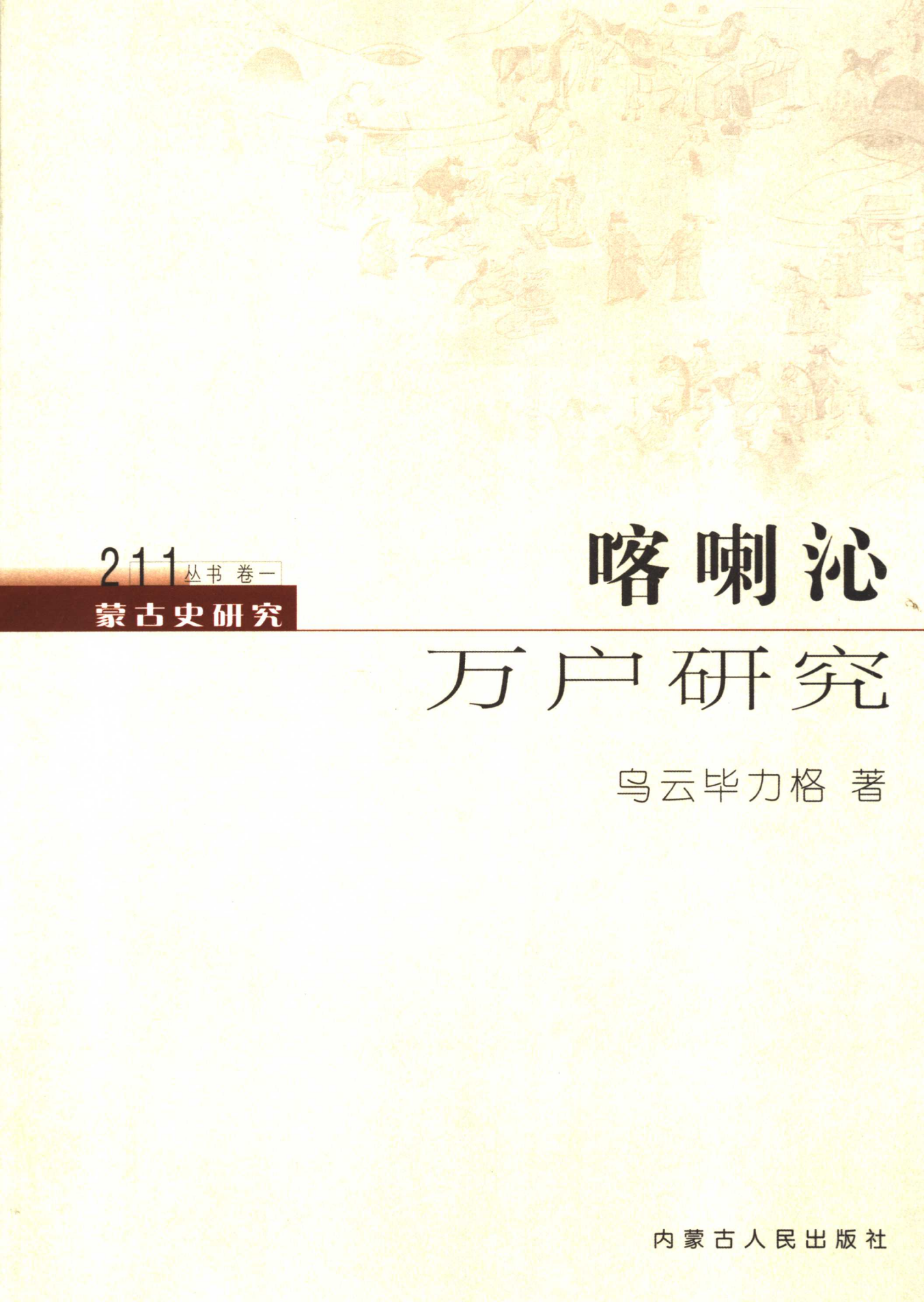




211 丛书 卷一
蒙古史研究

喀喇沁 万户研究

乌云毕力格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史研究

211 丛书 卷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喀喇沁万户研究

乌云毕力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史研究 211 丛书·喀喇沁万户研究/乌云毕力格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9

ISBN 7-204-08070-X

I. 蒙… II. 乌…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088 号

书 名	喀喇沁万户研究 (蒙古史研究 211 丛书 卷一)
主 编	乌云毕力格
作 者	乌云毕力格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204-08070-X/K.480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乌云毕力格 (Borjigidai Oyunbilig), 蒙古族, 孛儿只斤氏, 男, 1963 年 2 月 16 日出生于内蒙古原昭乌达盟巴林右旗。教授、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现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内蒙古历史学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1987 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 年德国波恩大学中央亚语言文化研究所中央亚语言文化学专业博士生毕业, 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 年至 1998 年担任德国波恩大学讲师, 2001 作为德国技术交流中心 (DAAD) 访问学者在波恩大学进行访问研究, 2002 年至 2004 年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 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和东京外国语大学合作研究员赴日本进行学术研究。从事 15 至 19 世纪蒙古政治与社会史、蒙藏关系史、满蒙关系史、满洲史及清代史以及满蒙档案文书与文献研究工作。著有《和硕特蒙古史纲要》,《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 (1696 ~ 1697) 的满文档案史料的流传史》,《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合著) 等专著, 在蒙古、日本、英国和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 从德文、日文和蒙古文翻译了十余篇文章。主持完成和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多项。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二木博史一起主编日本国际蒙古文化研究协会会刊 QMD。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十七世纪前期蒙古喀喇沁部与后金 / 清朝》(批准号为 01CZS001)的最终成果

本课题的研究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

本书的出版获得内蒙古大学“211 工程”二期建设重点项目经费资助

蒙古史研究 211 丛书

主 编 / 乌云毕力格

编 委 / 齐木德道尔吉 宝音德力根 白拉都格其 金海

技术编辑 / 巴根那

《蒙古史研究 211 丛书》序

乌云毕力格

蒙古史研究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学科，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的基石之一。1959年初，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建立了蒙古史教研室，1962年更名为蒙古史研究室，1982年定名蒙古史研究所。是年，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1995年，内蒙古大学成立蒙古学研究院（后改称蒙古学学院），以上两所研究所始隶蒙古学研究院。200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蒙古学研究中心在内蒙古大学成立，下设蒙古历史文化研究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蒙古史提供了条件。

近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经过亦邻真、周清澍、特布信等老一辈学者的精心经营和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如今已发展成为国际蒙古史研究中心之一。近年来，蒙古史研究被列入内蒙古大学“211工程”重点研究项目，成为学校重点建设的学科。在“211工程”第一期和第二期建设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人员通过组织科研项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通过科学研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一流学术带头人 and 中青年学术骨干，通过积极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发挥了对外交流窗口的作用。在“211工程”建设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主力积极承担国家和自治区科研项目，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齐木德道尔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项目《清初蒙古史史料及满蒙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蒙古史及北方民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国家清史工程《清史·民族志·蒙古族篇》、内蒙古自治区人事厅人才基金项目《清初蒙古档案整理研究》，乌云毕力格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喀喇沁部与后金（清）》、国家清史工程《清史·议政王大臣表》、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专项基金项目《17~18世纪西藏、卫拉特与清朝关系研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西域同文志》，宝音德力根主持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至17世纪蒙古史研究》、国家社科项目《内阁蒙古堂档与喀尔喀史研究》，张久和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蒙古史文献的比较与研究》，王雄主持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全边略记》，薄音湖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蒙古学百科全书·古代史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万历武功录》，郝维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内蒙古通史》、国家社科项目《蒙古学百科全书·近现代史卷》，白拉都格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内蒙古各业开发与社会文化

变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近代内蒙古的社会变革若干问题研究》，金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鄂温克族现代游牧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研究》、内蒙古自治区人才开发基金项目《日本占领时期的内蒙古历史研究》，乌云格日勒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近代内蒙古城镇的发展与变迁》，苏德毕力格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治边政策与边疆内地政治》，以及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人员同蒙古、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合作项目，为研究自古至今的蒙古史研究课题开辟了十分广阔的领域，使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主要由以下三个研究领域构成，其中有些领域的研究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第一，古代蒙古史及其文献研究。本研究领域人员主要从事蒙古帝国史、元史、15至18世纪蒙古史、蒙古历史地理以及有关蒙古的文书档案史料研究和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本领域成员着力于研究蒙元时期的政治制度、部族、部落和封建领地；15至17世纪东、西蒙古政局与部落，16至17世纪喀尔喀史，17世纪漠南蒙古诸部史；清代蒙古史；内蒙古历史地理；17世纪蒙古文书和满文档册、明末兵部汉文档案、清代内阁蒙古堂档和其他满汉蒙藏文各类档案。该研究领域人员在国内外国出版了《元史》标点本（亦邻真、周清澍等）、《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亦邻真）、《元蒙史札》（周清澍）、《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包文汉等）、《皇朝藩部要略稿本》（包文汉）、《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1~6集）》（金峰）、《〈蒙古源流〉研究》（乌兰）、《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齐木德道尔吉等）、《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齐木德道尔吉等）和《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齐木德道尔吉等）等重大的文献史料和文书档案整理研究成果和《内蒙古历史地理》（周清澍主编）、*Die Briefe des Kangxi-kaisers aus den Jahren 1696-1697 an den Kronprinzen Ying-ch'eng aus mandschurischen Geheimdokumenten, -- Ein Beitrag zum ersten Dsungarenkrieg der Ching 1690-1697*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Deutschland, 齐木德道尔吉)、《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乌云毕力格等）、*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über den persö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kaisers gegen Galdan (1696-1697)*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Deutschland, 乌云毕力格)、《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一、第二辑）》（宝音德力根等）等多部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并在蒙古、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国内重要杂志上发表了几百篇学术论文。多种文字史料的比较研究，历史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与史学的结合以及蒙古文、满文、汉文文书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是本研究领域的鲜明特色。新史料、新方法的利用，已使本领域在15至18世纪蒙古史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目前，该研究领域人员在喀尔喀史、蒙古六万户的变迁、漠南蒙古诸部史、蒙藏关系史等领域里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二，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本领域主要研究近代（1840年至1949年）和现当代（1949年至今）内蒙古地区以蒙古族为主的各民族历史。研究内容主要涵盖近代内蒙古政治变迁史、蒙古民族运动史、人民革命斗争史、内蒙古各行各业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史、外国侵略史、内蒙古自治区政治体制和方针政策演变（即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时期改革开放）、内蒙古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与成就以及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繁荣等。该研究领域人员出版和发表了《内蒙古近代简史》（郝维民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白拉都格其等）、《大青山抗日斗争史》（郝维民主编）、《百年风云》（郝维民主编）、《呼和浩特革命史》（郝维民主编）、《日本与内蒙古》（金海）、《博克多汗政府与内蒙古政治》（周太平）、《蒙古族——内蒙古正蓝旗巴彦胡舒嘎查调查》（金海主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1—4辑）》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成果显著，该领域也在国际国内处于先进地位。

第三，北方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研究。该研究领域包括秦汉至元代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元、明、清时期的蒙、汉、回、满、藏各民族关系史。本学科前辈学者在匈奴史、东胡史、突厥史以及蒙古族族源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匈奴通史》（林干）、《东胡史》（林干）、《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靺鞨研究》（张久和）、《和硕特蒙古史纲要》（乌云毕力格）等颇具影响和学术价值的专著和“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关于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亦邻真）等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学术论文。近年来，发表了有关满蒙、明蒙关系的论著多篇，主持了题为《蒙古史史料与满蒙关系研究》（齐木德道尔吉）和《17~18世纪西藏、卫拉特与清朝关系研究》（乌云毕力格）等专门研究民族关系的科研项目，发表了有关17世纪满蒙、蒙藏关系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在明代蒙汉关系研究方面，王雄等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内蒙古大学“211工程”建设成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史学科突飞猛进的大好契机。蒙古史研究作为内蒙古大学传统的优势研究领域，在蒙古学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次出版的《蒙古史研究211丛书》正是内蒙古大学“211工程”二期建设的《蒙古学与北方民族研究》子项目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共收录了四部专著。随着内蒙古大学“211工程”的继续建设，该丛书编委会准备陆续出版未来的多卷成果。

2005年8月25日

前言

提起“喀喇沁”一名，人们立即就会想到清代的喀喇沁三旗，甚至只会想到今天内蒙古赤峰市的喀喇沁旗。喀喇沁一名源远流长，喀喇沁的历史丰富多彩，喀喇沁的成员复杂多样。其实，今天的喀喇沁旗的喀喇沁蒙古人只是古老而庞杂的喀喇沁人集团的一小分支。

喀喇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蒙古西征时期的高加索地区的钦察人。元代，喀喇沁的先人是皇帝的怯薛军队及其家属。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之间，喀喇沁为庞大的蒙古游牧集团，15世纪中期以后归入应绍卜万户。达延汗统一东蒙古后，在原蒙古六万户确立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直接统治，应绍卜万户成为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后裔的属民。16世纪后半期，喀喇沁万户逐渐取代了应绍卜万户的地位和名称。1627年，察哈尔林丹汗西征，征服了右翼蒙古诸兀鲁思。1628年，喀喇沁万户解体。喀喇沁本部与女真-满洲人的爱新国结盟，万户其他成员或归降爱新国，或逃散，1635年，满洲人正式把喀喇沁本部并入爱新国，分隶蒙古八旗。在喀喇沁属部的兀良哈蒙古人（已改称喀喇沁）中，设立了两个“固山”，后来他们发展成为清代的三个喀喇沁札萨克旗。喀喇沁万户的其他成员中，东土默特人集团被编为清代东土默特二旗；阿速特的一部分被编入八旗，还有一部分可能融入到阿鲁科尔沁；永谢布人大部分融入外喀尔喀，一小部分则融入呼和浩特土默特。喀喇沁万户的历史发展的梗概大致如此。

喀喇沁万户，是原应绍卜万户、山阳万户和满官嗔-土默特万户等三万户部分成员的联合体，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后裔、孛儿只斤氏诸诺颜与成吉思汗名将者勒蔑后裔花当子孙、兀良哈氏诸塔布囊统治下的兀鲁思。过去，学术界对上述三万户的历史都有所研究。日本的和田清、青木富太郎、萩原淳平、森川哲雄等学者和国内的达力扎布、乌兰、宝音德力根等学者，在此研究领域前后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满洲和喀喇沁关系的研究方面，德国学者米歇尔·瓦雅尔斯（汉名魏弥贤，Michael Weiers）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作为一个万户的喀喇沁，还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喀喇沁万户的成立、该万户各个成员及其融入万户的过程、各集团的游牧地的分布、林丹汗西迁时期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动向、该万户与满洲和明朝的关系，以及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最后结局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撰

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解决以上诸问题。

自1998年以来,笔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17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并结合有关满文档册和明朝汉文档案,对17世纪前半期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构成喀喇沁万户的各集团、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喀喇沁万户与察哈尔、满洲关系的一些新史料,因此产生了撰写一部喀喇沁史的想法。2001年,该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得以立项,之后便着手正式研究和撰写。2002年,该项目被列入内蒙古大学“211工程”二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计划。2002年底,作者赴日本访问研究,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共同研究员,同日本著名蒙古史学家二木博史教授主持进行了题为“17世纪前半期南蒙古政治史研究”的科研项目,该项目的部分内容恰与喀喇沁万户研究有关。经过在呼和浩特、北京和东京近三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终于把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了。

在该书出版之际,谨向给与鼎力支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和日本学术振兴会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向作者提供种种帮助的二木博史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必须特别指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赵文工先生在百忙之中通读拙作,并对全书行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赵先生谨表诚挚的谢意!

最后,作者还想向巴根那、宝音特古斯、姑茹玛、希都日古、包国庆、图雅等同事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为书稿的校对和制作人名索引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尤其是巴根那为本书电子排版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

李儿只斤·乌云毕力格

2005年7月31日

于内蒙古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史料	(1)
第一节	史料的分类及其依据	(2)
第二节	有关喀喇沁万户的“遗留性史料”	(4)
第三节	有关喀喇沁万户的“记述性史料”	(8)
第二章	喀喇沁的起源与应绍卜万户	(14)
第一节	钦察人、哈刺赤与喀喇沁	(14)
第二节	应绍卜万户	(20)
第三章	喀喇沁万户的形成	(27)
第一节	喀喇沁万户的形成	(27)
第二节	阿速特与永谢布的地域分布	(29)
第三节	喀喇沁本部的发展	(31)
第四章	山阳万户的解体与东土默特人	(36)
第一节	山阳万户与朵颜兀良哈	(36)
第二节	朵颜兀良哈的分裂	(45)
	一、察哈尔对兀良哈人的经略经纬	(45)
	二、兀良哈归附蒙古右翼的过程	(50)
第三节	东土默特部的起源	(52)
第五章	喀喇沁万户中“诺颜-塔布囊”体系的形成	(54)
第一节	喀喇沁与兀良哈的“诺颜-塔布囊”体系	(54)
第二节	东土默特与兀良哈的“诺颜-塔布囊”体系	(57)
第三节	喀喇沁万户的名称来源与执政者	(60)
	一、万户名称	(60)
	二、喀喇沁万户的执政诸诺颜与塔布囊	(62)
第六章	喀喇沁万户与爱新国(一)	(67)
第一节	察哈尔西迁后喀喇沁人的动向	(67)
	一、喀喇沁诸诺颜的失败	(68)
	二、苏布地等大塔布囊的动向	(75)
第二节	喀喇沁部与爱新国结盟	(78)

一、两次敖木林战役·····	(80)
二、爱新国与喀喇沁的联盟及其性质·····	(85)
第三节 1628年至1635年的喀喇沁部·····	(92)
一、喀喇沁部诸台吉与塔布囊的关系·····	(92)
二、喀喇沁与满洲的联姻关系·····	(94)
三、喀喇沁与爱新国的同盟关系·····	(97)
第七章 喀喇沁万户与爱新国(二)·····	(103)
第一节 17世纪前期东土默特部诸诺颜与他们的根据地·····	(103)
第二节 东土默特与林丹汗·····	(108)
第三节 东土默特归附爱新国·····	(112)
第四节 阿速特和爱新国·····	(123)
第八章 喀喇沁、土默特与爱新国的对外关系·····	(129)
第一节 爱新国对察哈尔的战争与喀喇沁、土默特·····	(129)
第二节 爱新国与明朝关系中的喀喇沁、土默特人的角色·····	(136)
一、满明战争中的作用·····	(136)
二、满明经济关系中的中介角色·····	(140)
第九章 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结局·····	(148)
第一节 东土默特的结局·····	(148)
一、东土默特与明朝的战争·····	(148)
二、并入清朝与札萨克旗的建立·····	(151)
第二节 喀喇沁的结局·····	(156)
一、兀良哈塔布囊们的喀喇沁札萨克旗·····	(156)
二、喀喇沁黄金家族的结局与八旗蒙古·····	(158)
第三节 阿速特与永谢布的结局·····	(168)
结束语·····	(171)
引用文献·····	(173)
人名索引·····	(177)

第一章 史料

古代蒙古史家和当今蒙古学专家都喜称蒙古六万户为“达延汗六万户”。实际上，蒙古六万户早在达延汗以前就已形成，而且所谓蒙古六万户，也仅仅指蒙古中央诸万户而已。这六万户分别是：左翼的察哈尔、兀良哈和喀尔喀、右翼的鄂尔多斯、满官嗔-土默特和应绍卜。如果将成吉思汗诸弟后裔属下的左翼各万户和西蒙古卫拉特诸万户计算在内，达延汗时期的蒙古万户数就更多。实际情况是，答兰特哩袞战役后，达延汗将蒙古中央六万户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使蒙古黄金家族最终确立对六万户的直接统治。然而，达延汗的诸子分封导致了中央六万户的瓜分。随着达延汗子孙的再分封，中央六万户很快趋于瓦解，同时形成了一些新的万户和兀鲁思。喀喇沁万户的形成，也正在这一时期。它的形成，恰好说明了16世纪以后蒙古社会集团不断解体和相互融合的过程。

所谓的喀喇沁万户，是原应绍卜、山阳和满官嗔-土默特三大万户部分成员的联合体，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后裔、孛儿只斤氏诸诺颜与成吉思汗名将者勒蔑后裔花当子孙、兀良哈氏诸塔布囊统治下的兀鲁思。换言之，喀喇沁万户的前身是旧应绍卜、山阳、满官嗔-土默特这三万户。

到了17世纪20年代，东北亚政治史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的女真-满洲国家-爱新国¹日益强大，与蒙古的内喀尔喀、科尔沁建立联盟关系，吞并了察哈尔的某些鄂托克，严重威胁蒙古大汗林丹汗。1627年，林丹汗西迁，企图以武力镇服右翼三万户，最后依靠右翼势力，实现全蒙古的统一。林丹汗的西迁，使庞大的喀喇沁万户即刻土崩瓦解。渴望寻求同盟者的喀喇沁万户和爱新国便很快走到了一起。喀喇沁万户各部与爱新国的联盟，加速了察哈尔的败亡。

¹ 1616年，建洲女真首领努尔哈齐建立女真人的统一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命名为 Aisin gurun，意为“金国”。12~13世纪时，女真人曾经建立强大的国家，一度入主中原，国号“大金”（1115~1234），历史上称之为“金朝”。努尔哈齐取国号为“Aisin gurun”，具有立志恢复先人霸业的寓意。为了区分历史上的这两个“金国”，现在人一般称努尔哈齐所建金国为“后金”（1616~1635）。根据《旧满洲档》（17世纪10~30年代），17世纪初期的满文记载里，满洲人称自己的国家均为 Aisin gurun。在《清实录》（康熙朝、乾隆朝版本）和《满文老档》（18世纪后期）中，称“满洲国”（Manju gurun），是经过后人篡改的结果。这个篡改痕迹，在影印的《旧满洲档》里看得一清二楚。总之，“金国”是 Aisin gurun 的汉译，“满洲国”是对 Aisin gurun 的篡改，而“后金”是现代人的称呼。所以，本书采用了对原文 Aisin 的音译，称之为“爱新国”（参考了“爱新觉罗”的译写）。

研究喀喇沁万户各集团与爱新国的关系，对理解17世纪前半期蒙古人社会、政治的变迁，满洲人在南蒙古统治的逐步实现，都具有很深刻的意义。这也是17世纪满蒙关系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书将以历史的批判的研究法，对有关喀喇沁万户的17世纪蒙古文文书、旧满文档案和汉文档案文书进行充分的研究，正确利用明清两代的蒙、汉、满文官修史籍和私修史书，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喀喇沁万户的形成、发展和灭亡各阶段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试图探讨“遗留性史料”在“记述性史料”中流传的情况，纠正清代一些影响巨大的官修史书中的错谬。

本章首先介绍和评论有关喀喇沁万户的各种史料。

第一节 史料的分类及其依据

历史的、批判的史料学研究，是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应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因为，史料既是历史和史家之间的唯一的桥梁，同时又具有不同的层次和质量，不同的史料在反映历史事实的真实程度上可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严格区分不同的史料，仔细辨别真伪正误，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

根据不同的性质，史料可分为两种：一为“遗留性史料”，一为“记述性史料”。

原属过去历史事物的一部分而遗留至今的、从其最初形成就不以讲授历史为目的，而是因其他目的或原因形成的、无意中给人们提供可靠历史信息和知识的史料，我们称之为“遗留性史料”。这些史料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物），属于过去的“历史”，而不属于“历史记述”。它们或有形（如实物的、文字的、实物与文字合二为一的）或无形（抽象形态的）地保留到现在，但都是从当时的历史事件中直接流传下来，在其流传中没有第三者的“报道”、“描述”、“塑造”等等中介行为。这类史料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们的形成各有原因，但都不是以讲授历史、为当代或后世留下历史根据为其目的。所以，它们作史料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没有受到作者的“史学”思想即“史学”倾向性的影响。它们是历史的遗留，是较为可靠的史料。

遗留性史料有三组。第一组为“实物遗留”：如古建筑物、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如各种器皿、衣物、家具、车辆、农牧渔猎工具等）、艺术品、货币、人体遗留（如骨骼、牙齿、头发）和类此其他种种。第二组为“抽象遗留”，如口传材料反映的法律和行政等方面的情况、风俗习惯、语言、居民区域名或地籍名称等等。第三组为“文字遗留”：指的是为当时的公共或个人需要而产生的文字资料，即公共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私人的文件，但其中不包括以给当代或后世人们讲授历史为目的的文字材料。换句话说，“文字遗留”就是史家的“档案史料”，诸如诏令敕诰、题本奏折、法规法典、各种条约协定、各种证件证书、公务信函、法律和行政管理文件、谈判或审讯记录以及帐簿等等，简言之，能够以“证书”和

“文书”两个概念归类的所有文字材料。此外，还包括部分私人文件，比如私人信件、科学著作、交谈记录等等，只要它们能够提供关于某历史事件的过程或状态的信息与知识，而且其作者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三组史料在遗留性史料中含量最大。

“遗留性史料”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报道是无意识的。所以，第一：作为史料（而且只有作为史料），它没有倾向性。因为它是由史学家当作史料用的，而不是由它的作者作为史料创作（或制造）的。作为史料，它的作用往往与它当初的目的无关。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可以从这些史料中发现原作者根本没有想到对后人将会说明某些历史真相和事实的信息。比如，古人在墓穴里的随葬品和壁画等等，完全是为了死者，而不是为了后世的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但是，后人却从中“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风俗和文化。因此，“遗留性史料”是可靠的。第二：但是，因为它不是为给世人讲授历史而产生的，所以，它往往不能反映历史的内在联系，不力求“历史”的完整性。它的信息只能说明局部，而不说明整体。

“记述性史料”则指专门以给世人讲授历史为目的，由一个或若干个有明确目的的作者（编者）创作的文献。它们在对历史的记述中，贯穿着作者的目的、立场、观点、感情，受着作者编撰水平等诸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这类史料是人类有意识地记述历史活动的产物，作者的目的就是让当代和后人了解历史，所以他的报道是有着强烈的主观意识的。由于作者属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层，受到过不同的教育，具有不同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因此他报道历史的目的和动机都不尽相同，对历史的认识、表达的能力也都不尽相同。最终，历史记述和历史本貌不完全一致，甚至会大相径庭。所以，对这类史料不仅要进行审慎地真伪评判，还要进行正误评判。

“记述性史料”分两种：一种是口头叙述，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歌谣、口传的世系、历史故事等。另外一种书面记述，包括各种体裁的史书，诸如编年史、纪传体史书、纪事本末、实录、起居注、方略、地方志等等，还有墓志铭、碑文、自传、回忆录以及报刊杂志的报道等等。

“记述性史料”的特点是：第一，这些史料尽量解释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说明因果关系和经过。因为它是讲述历史的。如果说“遗留性史料”提供的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点”，那么，“记述性史料”提供的则是事情的各个方面，描画的是事件经过的“连接线”。第二，这类史料即使显得完整、圆满，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作者（叙述者）“精神机器”的产品，是历史的间接反映。历史事实、作者和“记述性史料”组成了一条线上的A、B、C三个点，而且C（“记述性史料”）既不是A（历史文件）的一部分，也不完全等于A。A和C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有时会完全取决于B，即作者。因为，“记述性史料”是史料作者对历史的记述和说明。从史料作者的角度去观察，如下两个问题对他的记述有特别大的影响：第一是报道对象的选择性。任何一个人的叙述和报道的对象，都是他认为是重要的、

有趣的、有意义的或值得向往的事情。所以,“记述性史料”的内容是深受作者主观认识的限制的。从《史记》到《清史稿》,中国所谓的正史,都很少记载古代农民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那些传记、回忆录、自传等著作也都不例外,传主感兴趣的是围绕传主的人和事,如果和传主的一生无关,哪怕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一定去写一笔。第二是“证据”的选择性。也就是史料的取舍问题。由于一个作者往往受到一个社会阶层、政治团体、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他围绕主题选择收集的论据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他在塑造报道对象的形象时,往往在道义上或者感情上带有倾向性。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下,编纂过程中的曲笔、杜撰和改写的现象比比皆是。

简言之,“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在史料性质上存在着巨大差别。

第二节 有关喀喇沁万户的“遗留性史料”

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期,在明朝、蒙古和满洲产生了丰富的文书和档案,文字种类包括汉文、蒙古文和满文。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喀喇沁万户史。这些史料,就其性质而言,都属于“遗留性史料”。

(一) 在上述“遗留性史料”中,当首推17世纪前期的蒙古文文书。这些文书至今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7年,该馆的李保文氏编辑、整理和影印了这些珍贵文书,定书名为《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Arban doloduyar jayun-u emün-e qayas-tu qolbuydaqu mongyol üsüg-ün bičig debter(1600~1650),以下简称《蒙古文档》)。《蒙古文档》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有关满蒙关系史的文书”,包括61份蒙古文书。下卷为“清朝理藩院记录档”,收录了1637~1647年间的50份理藩院蒙古文档案。上卷61份文书,是17世纪20~30年代的南蒙古与女真-满洲爱新国之间的官方书信往来。内容涉及蒙古嫩科尔沁、喀喇沁、东土默特、山阳诸塔布囊、敖汉、奈曼、察哈尔、阿巴噶、阿巴哈纳尔、阿速特、阿鲁蒙古、巴林、扎鲁特等诸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以及爱新国与这些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些文书中,只有6份在清代文献中经过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改变后流传下来,其余均不见于史乘。《蒙古文档》的影印出版,不仅展现了17世纪前半期蒙古文字原貌和蒙古文书格式,而且再现了文书外部特征(包括提写、留空格、使用表示敬意的特殊符号、涂改、插入、收件人和发信人的附注等等),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

在《蒙古文档》的61份文书中,至少有30份与喀喇沁万户有关,其中包括《蒙古文档》所收第8、9、12、14、15、17、18、19、25、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3、44、45、47、48、49、50号文书。它们是喀喇沁和东土默特的黄金家族成员、阿速特贵族、兀良哈氏山阳诸塔布囊等与满洲

天聪汗之间的书信往来（第49号文书是科尔沁的土谢图汗奥巴的书信，但事关喀喇沁）。这些文件，基本上都是叫做“书”的文书。“书”（蒙古语称Bičig，满语作Bithe），是当时蒙古贵族和爱新国朝廷所用的文书形式。蒙古和满洲的“书”，在格式上的唯一区别是蒙古人一般情况下都以意为“愿吉祥”的一句梵文祷告语开头（也有不用该祷告语的极个别的简短的书信），而满洲天聪汗的书从来不用这套语。除此之外，双方文书的发信人、收件人、正文、写成时间（极个别情况）这样的结构顺序，是完全一样的。很明显，满洲人是在同蒙古人的交往中学会了使用“书”这个文书的。这些文书产生的原因或目的，是蒙古—满洲双方为了向对方通知、说明或陈述当时的某一项具体事务。这些文件，不是出自史家之手，不是当代史的记述，而是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无疑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字遗留”。

《蒙古文档》是研究喀喇沁万户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蒙古社会的内部动态，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外部的史料所无法替代的。在这30份文书中，有一些在清代史书中不同程度地流传了下来。这一部分史料，可作相互比较，通过对原始史料流传过程的分析，澄清历史事实，复原历史本来面貌，揭露史书对史实的歪曲。还有相当多的文书，根本没被清代文献采用。这些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前人所不知的历史空白。

从17世纪流传下来的蒙古文书，每份都是“孤文书”。“孤文书”的特点是，它的成书背景、写作人、时间、地点、成书原因、文书内容与其他史实的关系，以及文书被处理的结果等等，都没有附带说明文字。以上诸因素，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得以证明。研究“孤文书”的最有效的途径，恐怕只有采用“综观研究法”。所谓的“综观研究法”，就是尽量全面解释文书反映的所有历史事件及其内在联系，并说明它们和当时历史活动的总关系。为此，要做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注释”。要做“注释”，首先应仔细研究文书的文本。文本研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要研究文本的文字和外部特征。文字研究当然包括文字书写形式和正字法等内容。文书外部特征，包括文本中使用的各种文书符号（比如被称作Birga的表示敬意，表示新段落，或表示其他意思的符号）、提写（拾写）、留空格、增补、删除、改写等需要解释的地方。二，要研究文本的语言。文本研究的语言学要求是相当高的。具有关于该文本语言的一般性的粗略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研究17世纪前期的蒙古文书，不仅要具备蒙古语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句法、方言研究等方面的修养，而且还要熟悉蒙古语在17世纪和在此以前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用研究现代蒙古语的方法阐释17世纪初期的蒙古文文书，只能导致错讹。三，要研究文书的种类（属性）。释读一份文书，仅靠研究文书的语言文字是不够的。这个文书，是政治宣传品，是行政管理文书，是条约、誓词，还是指令、奏折、报告，抑或是其他什么文书，这往往关系到整个文书的从语言到内容的所有层面。四，要研究文本形成的时间和地点。五，要研究文书的作者及其个性。“解释”的第二步，要进行“相互解释”。一个历史时